德国政党智库：血统、谬误、争议、前景

陈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北京　100017）

摘要：在世界智库之林中，德国政党智库久负盛名，堪与美国智库媲美。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主要关注推崇独立性、以政策咨询见长的美国智库，而对亲近政党、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的德国政党智库了解不深，甚至存在许多臆见和误解。本文介绍了德国政党智库的“基金会血统”，澄清了许多有关德国政党智库的臆见和误解，揭示了德国政党智库因“吃皇粮”而引发的争议，展望了德国政党智库的未来发展前景。

关键词：德国政治；政党智库；政治基金会；政党基金会；决策咨询制度；政治教育；外交；伊拉斯谟基金会

分类号：D73/77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Roots, Misunderstandings, Controversy, Prospect

Chen Yu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17,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world's think tanks,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have a long standing reputation and can be comparable to American think tanks. Unfortunately, for a long time, Chinese academia has mainly focused on American think tanks that advocate independence and are good at policy consultation, while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that are close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take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ir core mission do no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even have many incorrect assum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oots of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clarifies many incorrect assum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reveals 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use of public funds by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

*E-mail：thestrategist@sohu.com。

Keywords: German politics; partisan think tanks; political foundation; political party foundation; a consultative policy system; political education; diplomacy;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在世界智库之林中，德国政党智库久负盛名，堪与美国智库媲美。2021 年 1 月 28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简称 TTCSP）发布了《全球智库报告 2020》（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在该报告中，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简称 KAS）连续四年（2016-2019 年）被评为“最佳政党智库”的第一名，获得了“卓越智库”的殊荣。同时，该报告评选出的全球 38 家“2020 最佳政党智库”中，德国政党智库一举夺得 5 席，分别是排名第 1 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简称 FES）、排名第 2 的弗里德里希·瑙曼自由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für die Freiheit，简称 FNF）、排名第 3 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öll-Stiftung，简称 HBS）、排名第 8 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简称 HSS）和排名第 20 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Luxemburg-Stiftung，简称 RLS）。[1]如果考虑到在德国，政党智库的数量十分有限，那么《全球智库报告 2020》对德国政党智库作出的高度评价，足以让我们对德国政党智库下一个“少而强”的论断了。对于数量虽多但总体上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不尽如人意的中国智库来说，审视德国政党智库的成功之道，很有必要，正当其时。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主要关注推崇独立性、以政策咨询见长的美国智库，而对亲近政党、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的德国政党智库了解不深，甚至存在许多臆见和误解。在“智库时代”，加强对德国政党智库的研究，既能够为我国同类型智库的建设提供借鉴、启示与支持，又有助于我国智库避免“南桔北枳”的问题，更好地立足吾土、吾民、吾精神，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考察德国政党智库，不妨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入手。

1　被忽视的“基金会血统”

众所周知，德国政党智库大多是以基金会（Stiftung）的形式存在的——这是德国政党智库的鲜明特色。因此，考察德国政党智库，首先要了解德国人的结社传统和基金会文化。

德国人十分热衷于结社和过社团生活，他们自己甚至戏称：“三个德国人，必有一社团”（Treffen sich drei Deutsche, gründen sie einen Verein.）。德国人的结社传统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同时，德国法律充分保障公民的结社权。例如，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第 9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所有德国人均享有

结社的权利。”[2]当前，德国有登记的社会组织约 62.7 万家，未登记但可以正常活动的社会组织约 50 多万家，涵盖医疗、环保、教育、体育、文化、慈善、政治等多个领域。[3]考虑到德国仅有 8310 万人，[4]德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可谓是惊人的。

基金会是德国社会组织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我国民政部“基金会管理制度研究”培训团撰写的《德国基金会发展管理考察报告》准确地指出：“在德国，基金会是指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捐献资金或其他财产而设立的具有权利能力的财团组织。……基金会并非法律专属概念，协会、社会服务机构、股份有限公司、学校，甚至一些未登记的组织，均可使用基金会的名称进行活动。”[3]德国基金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据德国基金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utscher Stiftungen）的记录，有 5 家基金会自称源自 12 世纪，有 23 家基金会源自 13 世纪，有 35 家基金会源自 14 世纪。中世纪，成立基金会的主要是政界、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和富人，他们遵从基督教“爱邻人”的信条，乐善好施。[5]到 13 世纪，基金会事务正式成为教会法的组成部分。13 世纪之后，逐渐出现与教会基金会相区别的世俗基金会。[6]21 世纪以来，德国基金会蓬勃发展，数量达到 14 余万家（其中，约 10 万家为教会基金会，约 4 万家为世俗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在文化艺术、发展援助、社会运动、健康、政治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7]

可以说，正是由于德国深厚的基金会文化底蕴，德国政党才选择了基金会作为自己的成长伴侣。这是合乎情理、自然而然的事。以往，我国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普遍忽视了德国政党智库的“基金会血统”，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美国模式智库的先入之见来审视德国政党智库，导致了许多臆见和误解。

在历史的长河中，德国政党和基金会譬如交芦，互相依倚。我们将仔细地打量他们。

2　流传较广的臆见和误解

多年来，我国学者围绕德国政党智库钻坚研微，撰写了许多学术著作、文章。与此同时，一些错误的信息和观点也在我国学术界广为流传。澄清这些谬误，对于我们深化对德国政党智库的认识至关重要。

关于德国政党智库的数量。传统的观点认为，德国一共有 6 个政治基金会。他们是亲近基民盟的阿登纳基金会、亲近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亲近自民党的瑙曼基金会、亲近绿党的伯尔基金会、亲近基社盟的赛德尔基金会和亲近左翼党的卢森堡基金会。我们认为，该观点不够准确，亟需更新。一方面，该观点只统计了联邦一级或者说全国性的政治基金会，而没有统计联邦州一级的政治基金会。事实上，联邦州一级的政治基金会虽然规模和影响力都比较小，但数量众多，因此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近年来，德国联邦一级或者说全国性的政治基金会的数量也发生了变化——新增了亲近选择党的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基金会（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简称 DES）。总之，严格来说，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德国共有 7 个联邦一级的政党基金会，45 个联邦州一级的政党基金会。[8]

关于德国政党智库的命名。近年来，有多名学者撰文指出，德国政党基金会“以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我们认为，该观点同样失之于粗疏。就拿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阿登纳基金会来说，1964 年，该基金会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时任基民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名字命名时，阿登纳尚在人世，仍在德国政坛发挥重要作用，还没有成为“历史人物”。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德国政治基金会普遍以名人命名，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是为了专门纪念该名人而设立的。一方面，德国另有为专门纪念名人而设立的基金会。例如，当前，德国联邦议院设立了 6 个无党派的“联邦政治家纪念基金会”（Politikergedenkstiftungen des Bundes），以纪念 19、20 世纪在德国和欧洲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杰出历史人物。这些基金会由联邦预算资助，并接受联邦政府文化和媒体专员（BKM）的法律监督。[9]显然，联邦政治家纪念基金会跟本文的研究对象政治基金会完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政治基金会在以名人命名时，有时是有多个备选项的。例如，卢森堡基金会在最终定名前，人们曾就基金会的名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候选对象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恩格斯（Marx/Engels）、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女）、拉里莎·雷斯纳（Larissa Reissner，女）、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保罗·列维（Paul Levi）等。但是，由于卢森堡是唯一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基金会最终以卢森堡命名。[10]总之，德国政治基金会通常是以名人命名的。这个名人既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如卢森堡。）；既可能是德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卢森堡是波兰人，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人。]；既可能是活着的人（如阿登纳。），也可能是逝者；既可能是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是几百年前的古人（如伊拉斯谟。）；既可能与政治基金会有直接交往，也可能只是理念契合、心向往之，但实际上并无来往。

关于德国政党创立政党智库的原因。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愿的形成。”[2]据此，有学者说：“人民政治意愿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仅凭政党有限的力量是无法充分胜任的。在此情势下，政党想到了利用政治基金会来构造和缔结人民的政治意愿。于是，政治基金会就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我们认为，这纯属臆见。一方面，在德国，亲政党的基金会被明令禁止参与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赋予政党的“参与人民政治意愿的形成”任务。1998 年 2 月 12 日，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在有关弗朗茨·舍恩胡伯基金会（Franz-Schönhuber-Stiftung）的裁决中，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86 年 7 月 14 日就政治基金会问题作出的专门裁决（BVerfGE 73, 1 - Politische Stiftungen）[11]进行了解释。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明确指出：“亲政党的基金会不得参与人民政治意愿的形成。……基金会被禁止参与由《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确认的‘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愿的形成’的相关事宜。”[12]另一方面，在德国，公认的事实是，政党建立政党基金会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让后者开展政治教育工作。自 2000 年 7 月起一直担任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简称 bpb）主席的托

他们是：奥托·冯·俾斯麦基金会（Otto-von-Bismarck-Stiftung）、国家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纪念基金会（Stiftung Reichspräsident-Friedrich-Ebert-Gedenkstätte）、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故居基金会（Stiftung Bundespräsident-Theodor-Heuss-Haus）、联邦总理阿登纳故居基金会（Stiftung Bundeskanzler-Adenauer-Haus）、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基金会（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基金会（Bundeskanzler-Helmut-Schmidt-Stiftung）。

马斯·克鲁格（Thomas Krüger）明确指出："政治教育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我形象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再教育'（Reeducation）过程中的重点是民主教育时，政治教育中心在联邦和州一级成立了。结果，各种各样的附属教育机构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教育机构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议院中的各政党成立了大型基金会，与涵盖面很广的成人教育学院网络一起丰富了政治教育领域。这些机构都是由公共资金运营的。"[13]

关于创立政党智库的条件。在多篇由知名学者撰写并发表在知名报纸、期刊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类似于"根据德国政党法规定，连续两届进入议会并占有5%席位的政党可以创立政党基金会""根据德国政党法的规定，连续两届进入议会并占有5%的席位的政党，可以创立与之政治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基金会"的提法。但是，我们发现，德国《政党法》（*Gesetz über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中根本没有这一规定。[14]虽然德国《政党法》有两处提及了政治基金会（一处是"第11条　执行委员会"规定"一个政党的主席和财务主管不得在与该政党有关的任何政治基金会中行使类似的职能"，另一处是"第25条　捐赠"规定政党不得接受政治基金会的捐款。这两处都是在1983年12月22日修订《政党法》时增加的。[15]），但都显然与政治基金会的创立无关。事实上，德国政党在创立政治基金会时，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首先，多年来，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德国政党创立政治基金会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最近的一个例外发生在20多年前。1998年2月12日，由于计划中的基金会被认为将危害公共利益，德国共和党早在1989年10月就已经发起的建立以该党前主席命名的弗朗茨·舍恩胡伯基金会的行动被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彻底扼杀。[12]其次，对政治基金会的形式，法律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德国现有的7家联邦级政治基金会中，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伯尔基金会、卢森堡基金会、伊拉斯谟基金会等的法律形式是注册社团（Eingetragener Verein），瑙曼基金会的法律形式是私法基金会（Stiftung des privaten Rechts）。再次，对政治基金会的登记时间，法律同样没有要求。因而，一些政治基金会选择了"先上车，再买票"（指先运行，后登记。）。例如，1997年7月1日，伯尔基金会在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新总部开始工作；[16]但是，直到次年3月17日，伯尔基金会才首次进入社团登记簿。[17]最后，德国政党在创立联邦级的政治基金会时，有时会采取类似于德国历史上从多个选帝侯中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做法。具体来说，德国政党会从数个亲近本党的基金会或社团中，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基金会或社团，将其作为联邦级的政治基金会：在德国，常见的说法是某党承认某基金会为与其关系密切的政治/政党基金会，或者某党承认某基金会为联邦基金会（Bundesstiftung）。伊拉斯谟基金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成功"上位"的。自2018年初以来，选择党内部围绕应该选择哪个基金会或社团作为该党的政治基金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竞争主要在伊拉斯谟基金会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基金会（Gustav-Stresemann-Stiftung）之间展开，此外，伊拉斯谟学术基金会（Akademische Erasmus-Stiftung e.V.）、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民主协会（Johann-Gottfried-Herder-Verein für Demokratie）、伊曼纽尔·康德协会（Immanuel-Kant-Verein）等也跃跃欲试。最终，经过数月的争论，2018年6月30日，在奥格斯堡召开的选择党党代会（parteitag）上，近三分之二的人投票支持伊拉斯谟基金会。[18]

关于德国政党智库的核心使命。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例如，有人过分拔高外交工作，提出“阿登纳基金会的首要使命是非政治外交，即广义的外交。基金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交往，与各国分享德国的发展经验和成果，探讨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将这些活动汇报给德国政府”。又如，有人在撰写有关德国政党智库的文章时，依次介绍政策咨询、公共外交、政治教育，让人误以为政策咨询是德国政党智库最重要的工作。我们认为，不同于以政策咨询见长的美国智库，德国政党智库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一方面，这是德国政党智库的自我认知。翻阅 7 家联邦级政党智库的《章程》，我们发现，这些智库都将政治教育置于首要地位。同时，我们看到，这些智库的高管在对外发声时，反复强调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例如，自 2014 年起担任赛德尔基金会主席的乌苏拉·曼勒（Ursula Männle，女）强调：“德国亲政党的基金会的使命主要是促进民主。亲政党的基金会开展的面向所有公民的政治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19]另一方面，这也是德国社会各界的共同看法。多年来，无论是德国政党，还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联邦内政部、联邦外交部等官方机构，乃至德国总统、知名专家学者等权威人士，都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例如，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将“民主教育”（Erziehung zur Demokratie）视为“政治基金会的永久的、实际的任务”（permanente und eigentliche Aufgabe der politischen Stiftungen），认为其有助于“开放社会的公民可以尽可能有知识地参与民主的发展进程”。[20]

关于德国政党智库与政党的关系。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政党智库隶属于政党，并对诸如“赛德尔基金会是基社盟的下属组织”的说法见怪不怪。可实际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最高行政法院都反复强调亲政党的基金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独立于政党。特别是，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明确指出：“联邦宪法法院关于亲政党的基金会独立于各自政党的裁决禁止将基金会视为政党的‘附属组织’（Nebenorganisation）”。同时，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还驳斥了亲政党的基金会是“政党攫取国家财政的工具，可以说是渔民用来捕鱼的网”的错误说法。[12]

历史川流不息，时代的大潮波澜壮阔。多年来，德国政党和政党智库始终勇立潮头，共同应对各种风浪的挑战。他们都面临哪些挑战呢？

3 “吃皇粮”引发的争议

不同于美国智库，许多德国政党智库是“吃皇粮”的。然而，利之所在，瑕衅易滋，“皇粮”即公共资金也给德国政党智库招致了许多非议。

3.1 法律依据不充分

这是最大的争议。以往，一些国内外学者以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86 年 7 月 14 日就政治基金会问题作出的著名裁决已经为德国政党智库“吃皇粮”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例如，长期担任国际政治学协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简称 IPSA）政治金融和政治腐败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英国学者迈克尔·平托-杜欣斯基（Michael Pinto-Duschinsky）就

错误地认为，该裁决确认了向政党基金会提供联邦补助的合宪性（constitutionality）。[21]]，其实不然。这些学者，既可能是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耀眼光环所迷惑，也可能是被德国联邦政府、政党智库等的雷同话术所误导。

我们知道，1966 年 7 月 19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政党的融资问题专门作出裁决（BVerfGE 20, 56 - Parteienfinanzierung I），裁定鉴于政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党的一般工作不能划清界限，向政党提供用于政治教育工作的预算资金是违宪的。[22]随后，自 1967 财政年度起，德国联邦预算开始为亲政党的基金会提供“全球赠款”（Globalzuschüsse）。1967 年，900 万马克被作为“用于社会政治和民主教育工作的全球赠款”（Globalzuschüsse zur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und demokratischen Bildungsarbeit）。之后，全球赠款的金额强劲增长，其引发的争议也日益强烈。最终，1980 年成立、1983 年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院的绿党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诉讼。[11]

绿党主张，亲政党的基金会主要服务于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党的政治事务。基金会虽然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其母党（Mutterpartei）的手中，其人员和物质潜力可供其母党公开或秘密地使用。并且，即使是亲政党的基金会，也不可能在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党的一般工作之间划清界限。总之，绿党认为，向亲政党的基金会提供的全球赠款构成了对基金会所亲近政党的秘密融资，违反了《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和第 3 条第 1 款。德国联邦议院则辩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66 年 7 月 19 日的裁决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政治教育工作的合法性，而只是质疑国家对政党的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的支持。由于资助政党的政治教育工作被认为是违宪的，现在立法机构转而支持其他的致力于这项任务的社会组织。资助对象的这种变化保证了政治教育工作不会与政党的政治活动相结合。基金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独立于政党，并且其活动主要不是为了支持政党。总之，德国联邦议院认为，向基金会分配的全球赠款不是直接或间接的政党融资。[11]

1986 年 7 月 14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政治基金会问题专门作出裁决，裁定德国联邦议院在其通过的《1983 财政年度联邦预算法》（*Gesetz über die Feststellung des Bundeshaushaltsplans für das Haushaltsjahr 1983*）中编列 8580 万马克的全球赠款，并授权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将之分配给当时在德国联邦议院有议席的 4 个政党的基金会（即阿登纳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和瑙曼基金会）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基本法》不能作为本案裁决的主题；基金会的个别滥用行为并不能证明以下假设是正确的：全球赠款是秘密的政党融资；1983 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只为 1983 年已有的基金会提供全球赠款，这一事实没有侵犯绿党的权利，特别是没有违反（《基本法》第 3 条第 1 款规定的）平等原则（Gleichheitssatz）；将用于促进政治教育工作的公共资金分配给亲政党的基金会，前提是这些基金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独立于政党，以开放的心态独立地承担这项任务，并在实践中与政党保持必要的距离。[11]应该说，该裁决虽然为全球赠款开了“绿灯”，但却回避了至关重要的合宪性问题。随后，1988 年，绿党建立了彩虹基金会联合会（Stiftungsverband Regenbogen

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愿的形成。政党的建立是自由的。政党内部组织须符合民主制度的各项原则。政党须公开说明其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以及财产状况。”

德国《基本法》第 3 条第 1 款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V.），并承认其为与绿党关系密切的政治基金会。耐人寻味的是，当前，伯尔基金会官方网站讲述的自身简史不但绝口不提绿党早期对全球赠款的批判态度，反而大力宣扬绿党早在 1983 年之前就试图在联邦一级建立一个亲绿党的政党基金会。[16]

由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尊崇地位，德国联邦政府在介绍德国政党智库“吃皇粮”的法律依据时，屡屡搬出该院 1986 年 7 月 14 日的裁决。例如，2018 年 1 月 23 日，德国联邦政府在答复选择党联邦议院党团的质询时指出，原则上，由预算立法者决定全球赠款和项目融资（Projektfinanzierungen）。自 1967 财政年度开始拨款以来，联邦预算中给政治基金会的预算资源分配一直是在议院程序中进行的，属于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专属任务。促进政治基金会的做法符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为政治基金会的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全球赠款的裁决。《预算法》（*Haushaltsgesetzes*）之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资金支出的法律依据始终是《预算法》中规定的联邦预算。在某些情况下，各部委针对其业务领域已经发布了一些进一步的规范。[23]又如，2021 年 3 月 30 日，德国联邦政府在答复绿党联邦议院党团的质询时，基本复述了 2018 年 1 月 23 日的说法，此处不再赘述。[24]

和德国联邦政府一样，德国政党智库在谈论其获得的公共资金时，也是扯虎皮拉大旗，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86 年 7 月 14 日的裁决说事。此处不再举例。

总之，目前，由于向德国政党智库提供公共资金的法律依据是并非实体法律（materielles Gesetz）的年度性的《预算法》，以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86 年 7 月 14 日的裁决回避了全球赠款的合宪性问题，德国政党智库“吃皇粮”的法律基础并不牢固。

3.2 资金分配不公平

当前，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86 年 7 月 14 日的裁决，亲政党的基金会能否获得资助，决定性因素在于其是否代表了一种“持久的、重要的政治潮流”（dauerhafte, ins Gewicht fallende politische Grundströmung）。在国家实践中，这通常被解释为，如果相关政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连续两次跨过 5%的“门槛”，并以组成联邦议院党团的实力进入联邦议院，该基金会就将从联邦政府获得资金。[25]随后，如果相关政党仅一次未能满足“门槛条款”（Sperrklausel），该基金会也不会被剥夺资金。[26]显然，这对于大党十分有利，而对于小党和新成立的政党十分不利。在作者看来，这简直可以说是比“5%门槛”更难跨越的“双重门槛”。

多年来，稳坐在“双重门槛”之后美滋滋地“吃皇粮”的亲近德国主流政党的基金会一直备受指责。20 世纪 90 年代，共和党在给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的诉状中，攻击亲政党的基金会是“政党攫取国家财政的工具，可以说是渔民用来捕鱼的网”。[12]2014 年，德国生态民主党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议院政党的秘密国家融资”（verdeckte Staatsfinanzierung der Parlamentsparteien）。[27]近年来，向亲政党的基金会提供公共资金的做法，受到了 2013 年 2 月成立、2017 年 9 月的选举后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院的选择党

又叫项目资金（Projektförderung）。

关于“5%门槛”，德国联邦议院官方网站在介绍联邦议院选举时，对其作了粗略的解释：自 1953 年第二届联邦议院选举开始，选举联邦议院需要投两票。第一票使选民所在选区的一位候选人直接当选。选民将第二票投给某个政党。（除少数民族政党外，——作者注）只有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第二票中至少 5%的政党才能进入联邦议院。

的有力挑战。

起初，人们普遍轻视选择党。一些人更是幸灾乐祸地看待选择党遭遇的一次次挫败：在 2017 年 9 月的选举后，选择党多次向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拨款请求（例如，2020 年 8 月，选择党向该委员会申请 90 万欧元，以用于 2021 财政年度的“社会政治和民主教育工作”。[25]），多次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例如，2019 年 5 月 20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选择党提出的宪法诉愿（Verfassungsbeschwerde）不可受理。[28]又如，次年 7 月 22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选择党提出的要求德国联邦内政部支付用于 2018 和 2019 财政年度的共计 138 万欧元的款项的紧急申请。[26]］，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

慢慢地，人们开始重视选择党。来自竞争对手的重视未曾缺席：2021 年 3 月 16 日，德国联邦议院中的绿党党团就伊拉斯谟基金会的资金、人员、社会关系等问题专门质询德国联邦政府，一口气列出了涵盖 14 个具体问题的清单要求后者答复。[29]同月 30 日，德国联邦政府作出正式回应，指出伊拉斯谟基金会在法律、人员、组织和财务上独立于选择党。截至目前（指德国联邦政府作出回应时。——作者注），伊拉斯谟基金会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联邦资金的资助，并且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也没有收到任何资助。[24]

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信心比金子更重要。这一时期，在展望 2021 年 9 月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选情时，选择党信心爆棚，舆论普遍预期选择党将再度成功杀入德国联邦议院，亲近选择党的伊拉斯谟基金会随后将具备获得联邦资助的资格。在这种前景的驱动下，社会组织“安妮·弗兰克教育基地”（Anne-Frank-Bildungsstätte）和一些宪法学者、律师开始谋划，试图为伊拉斯谟基金会取得税款设置法律障碍。[25]

最终，不出意外地，选择党在 2021 年 9 月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得票 10.3%。[30]随后，一些媒体开始有鼻子有眼地“报道”伊拉斯谟基金会“已经获得”的联邦资助。例如，2022 年 1 月 11 日，我国澎湃新闻网发布了安吉尔·费雷罗（Àngel Ferrero）撰写的原载于美国《雅各宾》（*Jacobin*）杂志网站[31]的《从边缘势力到跨国联盟：欧洲的极右翼联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文章，称“在 2021 年 9 月的选举中保留了大部分席位后，德国选择党的西德里厄斯·伊拉斯谟基金会现在有资格获得国家资助，并由该党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据一些媒体报道，该党已经决定使用部分资金雇用 900 多名工作人员。”[32]

如果事情真像上述媒体“报道”的那样，估计选择党和伊拉斯谟基金会做梦都会笑醒。然而，真相并不美好。在 2021 年 9 月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后，伊拉斯谟基金会就踏上了漫漫维权路。2021 年 10 月，仍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伊拉斯谟基金会对外发声，声明自己有权在 2022 年获得约 700 万欧元，在随后的三年每年获得约 1400 万欧元。[33]2022 年 2 月 17 日，伊拉斯谟基金会主席艾莉卡·施泰因巴赫（Erika Steinbach，女）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火力全开，向公众讲述伊拉斯谟基金会的道理，控诉德国联邦政府（特别是联邦内政部）和联邦议院（特别是该院预算委员会）的无理，并要求具体参照卢森堡基金会的先例向伊拉斯谟基金会拨付公共资金。施泰因巴赫指出，由于 2022

年全球资金（Globalförderung）为1.32亿欧元，而选择党在最近三次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平均得票为9.13%（2013年得票4.7%，2017年得票12.6%，2021年得票10.1%。——作者注），伊拉斯谟基金会有权在2022年获得（全球资金总额的9.13%的一半，即）约600万欧元，在随后的三年每年获得（全球资金总额的9.13%，即）约1200万欧元。[34]

到目前为止，选择党和伊拉斯谟基金会仍在为伊拉斯谟基金会争取联邦资助，屡败屡战地向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拨款申请（例如，2022年5月19日，该委员会再次拒绝了伊拉斯谟基金会的拨款请求，引发了后者的愤怒声讨。[35]），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递状子（例如，2022年7月2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驳回了选择党提出的关于向伊拉斯谟基金会提供公共资金的申请。该院发布的裁判文书描述了2018年以来该案的原告选择党与5名被告德国联邦议院、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联邦政府、联邦内政部、联邦财政部围绕伊拉斯谟基金会的联邦资助问题展开的一轮轮较量的概貌。[36]）。在伊拉斯谟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可以轻松地找到该基金会在遭受一次次挫败后发布的一则则愤怒而不甘的声明。[37]

诚然，2021年3月，据德国《明镜》（*Der Spiegel*）周刊的消息，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BfV）已认定整个选择党为右翼极端主义"可疑案例"（Verdachtsfall）。[38]并且，次年3月8日，在一起选择党发起的诉讼中，科隆行政法院裁定，鉴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选择党内部存在反宪法的努力，允许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将整个选择党归类为右翼极端主义"可疑案例"，并对其进行监视。[39]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伊拉斯谟基金会是一个独立于选择党的社会组织，因为选择党的行为而对其搞"株连"，显然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德国著名的宪法专家克劳斯·费迪南·盖尔迪茨（Klaus Ferdinand Gärditz）教授就指出："由于基金会不是其所亲近政党的一部分，而是独立行事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政党官员的违宪行为归咎于基金会。"[25]更何况，2021年3月30日，德国联邦政府在答复绿党联邦议院党团的质询时，明确指出伊拉斯谟基金会不是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的"监视对象"（Beobachtungsobjekt）。[24]

政治就是政治。今天，和选择党掐得最起劲的，要数绿党和左翼党。可是，在熟悉德国政治的人们看来，绿党和左翼党对选择党的攻击，只不过是一出乌鸦笑猪黑的闹剧罢了。毕竟，早期的绿党经常以"另类"形象示人，长期被传统政党认为是激进、非主流的"乌合之众"。至于左翼党，一些人认为该党是极端主义政党，其对宪法和民主的承诺主要是工具性的。[40]并且，1995年7月，左翼党的前身民社党被确定为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的"监视对象"。[41]或许，选择党不是"完美受害者"，但如果有人说其遭遇了"双重标准"，诚不诬也。

未来，不知道选择党会不会效法当年的民社党，为争取联邦资助而绝食抗议。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费厄泼赖"（Fairplay）的实行，在哪里都不是容易的事。

3.3 国际工作讨人嫌

即全球赠款。
民社党是原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继任者。
1994年底，为抗议其选举补助被扣留，民社党曾进行绝食斗争。

第一个“槽点”是靡费甚巨。近年来，政治基金会的国际工作越来越费钱了。由于政治基金会花在海外的钱主要是由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联邦外交部资助的，[42]通过查询这两个部委提供给政治基金会的资金的数据，我们可以轻松地证实这一点。例如，仅 2017 年一年，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联邦外交部就分别向亲政党的基金会提供了 2.94805 亿、0.7238 亿欧元的资金，分别占当年德国联邦政府向亲政党的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总额的 50.7%、12.4%。[23]

第二个“槽点”是摊子太大。仅凭一点就足以说明人们的质疑并非毫无根据：当前，德国政治基金会在国外设立了大约 300 个代表处。[27]相比之下，德国政府在全球一共才开设了 227 个代表处，其中大使馆 153 个。[43]

第三个“槽点”是自行其是。由于德国政治基金会是独立话事而非听令行事的社会组织，其偶尔会与德国官方的外交工作步调不一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斯维特兰娜·珀格蕾斯卡娅（Swetlana W. Pogorelskaja，女）在《作为德国外交政策主体和工具的亲政党的基金会》（*Die parteinahen Stiftungen als Akteure und Instrument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文章中，为我们列举了若干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2000 年，由于伯尔基金会在柏林举办“伊朗会议”（Iran-Tagung），德国与伊朗之间的双边关系受到了负面影响 。[44]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槽点”是由东道国贡献的：干涉内政。有些时候，东道国的言辞十分激烈。少数情况下，东道国还会下达“逐客令”。几十年来，从拉丁美洲到中东欧和独联体，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最近的例子发生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总统治下的俄罗斯。2022 年 4 月 8 日，在和乌克兰大打出手的同时，俄罗斯撤销了伯尔基金会等德国政治基金会的注册，从而断然禁止了这些基金会在俄罗斯的活动。作为回应，伯尔基金会等发布了针尖对麦芒的声明。[45]

总之，多年来，德国政党智库在悠哉游哉地“吃皇粮”的同时，经常在法律依据、资金分配、国际工作等方面备受指责。此外，德国政党智库还因资金使用不当、财务状况不透明、将高管职位作为政治酬庸等问题招致批评。由于这些问题重要性相对较低，此处不再赘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过去近百年的日升月恒中，德国政党和政党智库男有分，女有归，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我们该如何评价德国政党智库呢？其未来发展前景又如何呢？

4　尚不明朗的发展前景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作为关注度较高的“演员”，迄今为止，德国政党智库已经在德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唱念做打”了近百年，对“喝彩”和“喝倒彩”都早已司空见惯。对于旁观者来说，静心而论，在考察德国政党智库时，如果只专注于纷纷物议，未免失之于浅薄，甚至有可能得到“假象”而失去“真相”。

我们认为，德国政党智库是一项政治制度。在评价该制度时，可以借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的精辟分析。首先，该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德国政党互相配合的。其次，作为一项已经沿袭近百年的制度，其虽然发端于数个大党的私心，但也迎合了政治教育的公共需要。再次，该制度有利有弊。毕竟，正如钱穆所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最后，该制度既有渊源，也必有流变。[46]当前，德国政党智库正面临改变的契机。

多年来，亲政党的基金会获得的公共资金的数额一直十分巨大。德国联邦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其在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7 年向亲政党的基金会支付的资金的总额，分别是 2.60323 亿、2.93138 亿、4.22121 亿和 5.81428 亿欧元。[23]近年来，亲政党的基金会分得的"蛋糕"继续保持着强劲增长的势头 。2022 年，联邦资金将向亲政党的基金会拨付 6.59 亿欧元。[47]

我们预见，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相对缓和的"增长政治"加速转变为竞争激烈的"分配政治"，亲政党的基金会在国内外都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德国，民众对政党有《政党法》，与此同时获得的公共资金早就远远超过政党的政党基金会（例如，2017 年，联邦预算中对政治基金会的支出是政党融资的 3.6 倍。[48]）却没有实体法律的"怪象"，必定会给予更猛烈的抨击。

事实上，当前，"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德国纳税人联盟（Bund der Steuerzahler）等社会组织纷纷呼吁制定《基金会法》（*Stiftungsgesetz*），以对德国政治基金会进行法律规制。值得注意的是，"透明国际"组织还建议，未来德国应发布整个政治行动的融资报告，该融资报告应包括国家向政党、政治团体和基金会支付的所有款项。针对目前采取的在联邦预算中将此类支出拆分成许多的单独项目和特别项目的做法，"透明国际"组织提出了批评。[27]

展望未来，一部类似于《政党法》的《基金会法》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必将极大地缓解德国政党智库面临的国内舆论压力。当前，绿党推动制定《基金会法》，但有人怀疑绿党的真实意图是利用《基金会法》阻止伊拉斯谟基金会获得公共资金。[49]由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对《基金会法》持怀疑态度。该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托尔斯滕·弗雷（Thorsten Frei）在 2021 年时曾指出："国家是否、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以及支持谁的问题不一定亟需一种特定的法律规范。"与此同时，选择党联邦议院党团则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该法律草案原则上要求取消对所有亲政党的基金会的资助。[25]最后，"小可怜"伊拉斯谟基金会支持制定《基金会法》。[33]

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更何况，作者是站在黄河之滨，畅想蓝色的多瑙河。文中错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由于资金由数个联邦部委分别提供（例如，联邦内政部负责提供全球赠款，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负责提供奖学金。），迄今为止德国联邦预算中没有任何标题可以用来一目了然地记录德国政治基金会的所有费用。

[1] MCGANN J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OL]. (2021-01-28)[2021-10-12].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9&context=think_tanks.
[2] 德国联邦议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M]//张文红. 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德国.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3-68.
[3] 廖鸿,周龙,雷承佐,等. 德国基金会发展管理考察报告[J]. 中国社会组织, 2017(2): 41-46.
[4] Facts about Germany. Enriching Diversity[EB/OL].[2022-10-06]. https://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en/germany-glance/enriching-diversity.
[5] 孙春苗. 比较视野下的基金会发展样态与借鉴——墨卡托访问团项目（2017）考察报告[J]. 中国社会组织, 2017(16): 41-46.
[6] 公维娜.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考察团赴德国、比利时基金会考察报告[J]. 中国社会组织, 2015(23): 51-56.
[7] 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赴德国考察团. 德国、比利时基金会考察报告[J]. 中国社会组织, 2015(18): 44-49.
[8] Wikipedia. Parteinahe Stiftung （ Deutschland ） [EB/OL].[2022-06-30]. https://de.wikipedia.org/wiki/Parteinahe_Stiftung_(Deutschland).
[9] Stiftung Reichspräsident-Friedrich-Ebert-Gedenkstätte. Die Stiftung[EB/OL].[2022-05-26]. https://www.ebert-gedenkstaette.de/pb/Startseite/Die+Stiftung.html.
[10] SCHÜTRUMPF J, WITTICH E. Eine polarisierende Person[EB/OL].[2022-05-22]. https://www.rosalux.de/publikation/id/39683/eine-polarisierende-person.
[11] Deutscher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VerfGE 73, 1 - Politische Stiftungen[EB/OL].(1986-07-14)[2022-08-07].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v073001.html.
[12] Deutscher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Urt. v. 12.02.1998, Az.: BVerwG 3 C 55/96[EB/OL].(1998-02-12)[2022-09-25]. https://research.wolterskluwer-online.de/document/b22e760a-9149-4787-a701-c3815c2ad13c.
[13] KRÜGER T. Aufarbeitung von Diktaturen in Argentinien und in Deutschland: Vergleichende Überlegungen und Schlussfolgerungen für die politische Bildung [EB/OL].(2006-08-30)[2022-06-26]. https://www.bpb.de/die-bpb/presse/51159/aufarbeitung-von-diktaturen-in-argentinien-und-in-deutschland/.
[14] 德国联邦议院. 德国政党法[M]//张文红. 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德国.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105-132.
[15] Deutscher Bundestag. Gesetz zur Änderung des Parteiengesetzes und anderer Gesetze[EB/OL].(1983-12-22)[2022-08-08]. https://www.bgbl.de/xaver/bgbl/start.xav#__bgbl__%2F%2F*%5B%40attr_id%3D%27bgbl183s1577.pdf%27%5D__1659929771455.
[16] Heinrich-Böll-Stiftung. Zur Geschichte der Heinrich-Böll-Stiftung[EB/OL].[2022-06-17]. https://www.boell.de/de/geschichte-der-stiftung.
[17] Heinrich-Böll-Stiftung. Verpflichtung zu Transparenz: Die Heinrich-Böll-Stiftung auf einen Blick[EB/OL].[2022-06-15]. https://www.boell.de/de/stiftung-leitbild-initiative-transparente-zivilgesellschaft.
[18] Wikipedia.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EB/OL].[2022-07-03].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19] MÄNNLE U. Der Auftrag der parteinahen Stiftungen in Deutschland ist die Förderung der Demokratie[EB/OL].(2019-06-17)[2022-11-10]. https://www.stiftungen.org/themen/der-auftrag-der-parteinahen-stiftungen-in-deutschland-ist-die-foerderung-der-demokratie.html.
[20] Hanns-Seidel-Stiftung. Wir über uns[EB/OL].[2022-06-13]. https://www.hss.de/ueber-uns/.
[21] DUSCHINSKY M P. The Party Foundations and Political Finance in Germany[M].// SEIDLE F L. Comparative Issues in Party and Election Finance: Volume 4 of the Research Studies. Toronto: Dundurn Press, 1991. 190.
[22] Deutscher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VerfGE 20, 56 - Parteienfinanzierung I[EB/OL].(1966-07-19)[2022-08-06].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v020056.html.
[23] Deutscher Bundesregierung. Antwort （Parteinahe Stiftungen） [EB/OL]. (2018-01-23)[2022-08-23]. 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19/005/1900503.pdf.
[24] Deutscher Bundesregierung. Antwort （Förderung der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EB/OL]. (2021-03-30)[2022-05-08]. 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19/281/1928130.pdf.
[25] SULIAK H. Gesetz soll Steuergeld für AfD-Stiftung verhindern[EB/OL].(2021-04-27)[2022-09-26]. https://www.lto.de/recht/hintergruende/h/afd-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verfassung-grundgesetz-finanzierung-politische-bildung-bundesmittel-parteien/.
[26] ROSSNER S. Erst einmal kein Geld vom Bund für AfD-nahe Stiftung[EB/OL].(2020-08-19)[2022-09-28]. https://www.lto.de/recht/hintergruende/h/afd-bverfg-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bundesmittel-eilverfahren-partei-fuenf-prozent/.
[27] LUTZ M, MÜLLER U. Parteinahe Stiftungen kosten Steuerzahler 581 Millionen[EB/OL]. (2018-02-12)[2022-09-24].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73425205/Bundestag-581-Millionen-Euro-fuer-parteinahe-Stiftungen-bewilligt.html.
[28] LTO-Redaktion. AfD-nahe Stiftung scheitert mit Verfassungsbeschwerde[EB/OL].(2019-05-29)[2022-09-29]. https://www.lto.de/recht/nachrichten/n/berfg-2bvr64919-afd-partei-nahe-stiftung-zuschuesse-foerdermittel-bundestag-haushalt/.
[29] BÜNDNIS 90/DIE GRÜNEN. Kleine Anfrage （Förderung der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EB/OL].(2021-03-16)[2022-05-08]. 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19/275/1927585.pdf.
[30] Facts about Germany. Bundestag election 2021: The results[EB/OL].[2022-09-30]. https://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index.php/en/politics-germany/bundestag-election-2021-results.
[31] FERRERO À. In Europe, the Far Right Is Uniting Its Forces[EB/OL].(2022-01-04)[2022-09-27]. https://jacobin.com/2022/01/abascal-vox-orban-fidesz-eu-parliament-alliance.

[32] 澎湃新闻网. 从边缘势力到跨国联盟：欧洲的极右翼联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EB/OL]. (2022-01-11)[2022-05-07]. http://m.thepaper.cn/uc.jsp?contid=16182561.
[33]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Rundbrief Nr. 21 im Oktober 2021 - Antworten auf Journalistenfragen[EB/OL].(2021-10)[2022-10-02]. https://erasmus-stiftung.de/rundbrief-nr-21-im-oktober-2021-antworten-an-den-tagesspiegel/.
[34]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DES-Pressemitteilung 18.02.2022[EB/OL].(2022-02-18)[2022-10-02]. https://erasmus-stiftung.de/des-pressemitteilung-18-02-2022/.
[35]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DES-Pressemitteilung 20.05.2022[EB/OL].(2022-05-20)[2022-10-02]. https://erasmus-stiftung.de/des-pressemitteilung-20-05-2022/.
[36] Deutscher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VerfG, Beschluss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8. Juli 2022 - 2 BvE 3/19[EB/OL].(2022-07-28)[2022-10-14].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e/es20220728_2bve000319.html.
[37]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DES-Rundbriefe[EB/OL].[2022-10-02]. https://erasmus-stiftung.de/aktuell/.
[38] WIEDMANN-SCHMIDT W. Verfassungsschutz beobachtet AfD nun bundesweit[EB/OL].(2021-03-03)[2022-10-14].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rechtsextremismus-verdachtsfall-verfassungsschutz-beobachtet-afd-nun-bundesweit-a-136d80ce-4549-4a23-8174-19ad70f20643.
[39] Redaktion beck-aktuell. Verfassungsschutz darf AfD als Verdachtsfall einstufen[EB/OL].(2022-03-09)[2022-10-14]. https://rsw.beck.de/aktuell/daily/meldung/detail/vg-koeln-verfassungsschutz-darf-afd-als-verdachtsfall-einstufen.
[40] DECKER F. Die Programmatik der LINKEN[EB/OL].(2021-01-05)[2022-10-17].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parteien-in-deutschland/die-linke/42133/die-programmatik-der-linken/.
[41] DER SPIEGEL. »Stigmatisiert und geächtet«[EB/OL].(1995-07-23)[2022-10-17].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stigmatisiert-und-geaechtet-a-309a00fc-0002-0001-0000-000009203983.
[42] MASSING P. Politische Stiftungen[EB/OL].(2015-03-19)[2022-05-25]. https://www.bpb.de/lernen/politische-bildung/193401/politische-stiftungen/?p=all.
[43] BISCHOFF M, CHAUVISTRÉ E, KLEIS C, et al. Tatsachen über Deutschland 2018[M/OL]. Frankfurt: FAZIT Communication GmbH, 2018. https://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files/2020-11/tatsachen_2018_deu.pdf
[44] POGORELSKAJA S W. Die parteinahen Stiftungen als Akteure und Instrument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EB/OL].(2002-05-22)[2022-10-03].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27121/die-parteinahen-stiftungen-als-akteure-und-instrumente-der-deutschen-aussenpolitik/.
[45]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Statement on the ban of the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in Russia[EB/OL].(2022-04-08)[2022-10-03]. https://www.boell.de/en/2022/04/08/statement-ban-heinrich-boll-foundation-russia.
[46]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序2、2.
[47]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DES-Pressemitteilung 05.08.2022[EB/OL].(2022-08-05)[2022-10-02]. https://erasmus-stiftung.de/des-pressemitteilung-05-08-2022/.
[48] PEHLE H. Die Finanzierung der Parteien in Deutschland[EB/OL]. (2018-03-14)[2022-09-19].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parteien-in-deutschland/42042/die-finanzierung-der-parteien-in-deutschland/.
[49]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Pressemitteilung 9.4.2021[EB/OL].(2021-04-09)[2022-10-02]. https://erasmus-stiftung.de/2005-2/.